

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

—— 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选

■ 郭建中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翻译：理论与实践与教学

—— 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选

..... ■ 郭建中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选
/ 郭建中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308-08047-7

I. ①翻… II. ①郭… III. ①翻译—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261 号

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选
郭建中 著

责任编辑 张颖琪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543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047-7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序 一

李亚舒

农历(庚寅年)仲春时节,北京正是玉兰花含苞待放的时候,郭建中教授从美国来电,说他仍在美国照看可爱的小外孙女,享天伦之乐。同时,还约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翻译研究论文选《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以下简称《翻译》——笔者注)写序。随后就发来了全书的目录和文章,令人感到非常高兴。

1994年,我曾有幸以“科学的小说,小说的科学:访著名科幻小说翻译家郭建中教授”为题在《中国翻译》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明了我向建中兄学习的态度。十年之后,我又以“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篇名,为其《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新书的出版写序。该书是他应我和黄忠廉教授的邀请,是我们主编的“科学翻译研究”卷系列丛书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专著之一。我们对他的及时支持充满了谢意。现在,我又有机会为建中兄的新书出版写序,重温学友之谊,分享仁兄之乐,怎能不感到格外激动呢!

—

回眸往事,我们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以文会友”的方式结识的。近20多年来,我们虽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单位工作,但是,我们经常见面,保持联系。特别是他成为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之时,我担任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协会的秘书长之职。在兼任《中国科技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之后,我们的工作联系就更加密切了。20世纪90年代末起,我在任《中国科技翻译》主编工作的10年间,建中兄对我个人和我们的刊物都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指导。无论在国内繁忙的教学岗位上,还是到美国探亲访问的时候,他总是记得我这位老朋友。这并不只是简单地通报自己的行踪,而是问我工作上的具体需要。他也总是根据我的书信内容,做到有信必复,有求必应。20世纪

90年代及其随后的岁月里，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大大发展，对国外的翻译介绍也十分活跃。建中教授出版了专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书中不少章节的内容，例如，托尔曼和他的《翻译艺术》、阐释学与翻译研究、庞德的翻译和翻译思想、语言学翻译研究的奈达翻译理论、雅各布森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中的韦努蒂翻译策略等原文资料都曾先后寄给我看，满足了我刊编辑部和读者的一些具体要求，令我非常感动。我深深知道一个学者为了支持朋友的工作，把自己辛辛苦苦在国外亲自搜集的翻译信息和外文资料，和盘托出，先让别人分享，这不仅仅是对朋友的信任，更是一种为促进中国翻译事业快速发展、具有崇高责任心的表现，真是令人钦佩不已。

作为中国译协的一名理事，郭老师也是积极负责的。早在中国译协林煌天秘书长主持常务工作时，我们就有多次交流。后来，中国译协在杭州主持召开的全中国译协秘书长会议、华东六省市在杭州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以及浙江省译协年会上，我们都曾有过多欢聚。20多年来，凡是由浙江省译协承办的会议，我们总是能全场看到他坚定、结实的身影，看见他与鲁仲达教授（秘书长）亲切地接待客人。一些事本来可以交由学生来办的会务，他俩都亲自出马，用他们身边当时的副秘书长徐锡华教授（现在省译协副会长）的话说，就是当时他担心抽调学生多了，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另一件印象最深的事是1994年5月在萧山（离杭州30千米）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大中型企业翻译研讨会。当时中国译协会长叶水夫身体不适，叶笃庄副会长正在海外探亲，特请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宋书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前来主持会议，我作为大会主席，由于事先对一些准备情况估计不足，我和高峰（大会秘书长）遇到了某些具体困难，只好电请浙江省译协的支持。建中兄闻讯后立即带领了一批年富力强、学养有素的老教师前来参会，并帮助主持分会活动、协助承办单位圆满地完成了会务工作，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好评，也再次加深了我对建中兄严谨治学、每事躬躬、宽厚包容的认识。

向建中兄学习的实例，是不胜枚举的。记得第十二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于2006年7月在乌鲁木齐召开，当时的中国译协刘习良会长、中科院译协的陈竺会长（中科院副院长）都给大会发来了亲自签署的书面贺词，我们的学术带头人中科院的译协副会长李佩先生是我的老师，因年岁已高，夏天不宜长途跋涉到西北地区来主持研讨会。我们虽然还是事先早已请了几位知名科学家赴会作学术报告，但是这次报名参会的代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多。我当时作为中国译协的副会长兼科技翻译委员会的主任深恐难以主持好这次大会

工作,经同组委会(邱举良、晏勤、赵文利等领导同志)商定,特请郭建中教授在大会当日开幕式后作主题报告。建中老师收到我们的函电后,立即接受邀请,并在杭州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以《时间简史》(普及版)的翻译为例,进行了长篇学术讲演,受到了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后来,《中国科技翻译》在2007年第2期上的头版头条“科技翻译研究”专栏里,以“重写:科普文体翻译的一个实验”为题,全文发表了这篇学术性强,又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论文。这让我再次深切感到,只要有同建中兄见面的机会,就必有学术上的获收。2008年8月,国际翻译家联盟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浙江省译协在上海国际会议大厦一层设立了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展厅,展出了浙江省翻译人才雄厚、翻译作品丰富的实况。作为浙江省译协的资深会长,他带领了省译协的强大阵营出席上海大会,那次现场讲解介绍的热情场面,至今仍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在这次大会上,郭建中还应邀在“应用翻译分论坛”大会上,做了题为“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的主旨发言。所以,这次,我又满怀激情,在回眸片刻美丽画面之后,就马上开始阅读建中兄给我新近发来的材料。有些论文虽然也曾在报刊上读到过,但这次重新阅读,又有不同的体会,进一步领悟到他作品中始终具有的那种独特而丰富的真知灼见。

二

非常明显,《翻译》是一部境界极高的学术精品。全书分上编、下编和附录三部分。上编里,汇集了建中教授30多年来正式发表的大部分重要论文,共有32篇。其中“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和“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等文章,论证自己从不同的理论角度,从亲身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是作者颇具匠心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也表达了作者对国内外一些翻译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创新思维,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下编里,选入了作者为自己的专著和重要译作写的序言、后记以及作者为学术界同行的专著写的涉及翻译方面的序言,共有13篇。这些文章,既中肯评议了朋友专著的学术价值,也阐述了作者本人的翻译(思想)观点,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意义。

附录部分,选入了全国各地学者为建中教授的著作写的序言、评论及对他的访谈文章。因为全国同行们对建中老师的睿智而深刻的翻译见解,认真

而严谨的学术风范,细致而生动的课堂教学,亲切而朴实的待人接物,有广泛的认同和敬仰。所以,他的论著在我们的学刊上一直被学术界视为重要参考文献,其引用率也一直是最高的作者之一。

建中教授的翻译观是十分明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管是英译中,还是中译英,在忠实于原文意思的前提下,译文必须通顺易懂。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建中教授把译意、替代、重构、重组、重写的方法和技巧,提高到在语言操作层面上对翻译本质的认识问题。其中特别提出,替代和重写是翻译本质的观点。这是郭建中教授在总结翻译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其理论基础是汉英两种语言在语法和词汇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用译入语的表达方式来替代源语的表达方式。在文化操作方面,“归化”抑或“异化”,则视原作者的目的、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译文读者对象等可变因素而定,并认为,可以把归化与异化的概念纯粹作为话语策略来考虑,但不排除话语策略的选择对文化移植和译者对外国文化与外语文本道德态度的影响。因而提出了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的重新定义和组合。他说:“我们发现,由于直译和意译与异化和归化的定义中,都同样涉及了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因此,在讨论中,许多译学论著,实际上是把两种概念混淆了起来。在讨论直译、意译的时候,谈语言形式问题,也谈文化移植和转换的问题;在讨论异化、归化的时候,谈文化和内容的问题,也谈语言的表达形式问题。结果是:异化和归化问题的争论,基本上还是延续两千年的直译和意译之争。”郭建中教授接着写道:“我们重新定义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的原则是:把语言与文化、形式和内容分开来处理。同时,撇开意识形态问题,只就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

这个“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也就是我们译坛近30年来热烈讨论的诸多学术问题之一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可以说,郭建中教授无愧于是中国译坛上的一面旗帜,是我们“翻译研究与教学”上的一个典型代表。

三

一般地说,学术界的同行,都是自己的朋友。具体地说,郭建中教授是我的学术诤友。但是,说来也巧,只要我外出参加翻译学术活动,我总能遇到郭老师培养成才的学生。他们在作自我介绍时,都总是说,我是郭建中教授的学生,并洋溢着一种自豪感。这使我很有感触,在进一步交谈中,让我了解和体会到是他们为自己拥有像建中这样的名师而感到幸运喜悦。

最近，我到江西吉安参加学术活动，也幸遇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韩晓方院长，他还是吉安人大副主任。在他以东道主身份安排的几次活动中，也多次谈起自己是郭教授学生的成长历程。真是名师出高徒，这又一次加深了我对郭建中教授人品、学品的仰慕。

郭教授的高徒不仅分布在国内外，就是杭州也有我认识的多位朋友。他们早已享有全国知名度。建中兄在教书育人岗位上的贡献是杰出的，也是多方面的。这里无须赘言。但我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他淡泊名利，总是谦虚宽厚，十分低调，从不张扬自己，总是潜心教学和翻译研究事业，这让我在阅读《翻译》论文选时，自然地增加了新的思考：

首先，要全面理解“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内涵，尤其是怎样当好一名高校的翻译教师，光靠加班加点地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要能教翻译课，就要自己从事翻译；要能教好翻译，就要自己有翻译实践经验；要能理解翻译的难处和美妙之所在，就要研究翻译理论。作者把“教一译一研”的经验总结为“三位一体”，这不仅是《翻译》理论的升华，而且，也是对广大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这也将是培养更多翻译博士和博士后的课题，我们可以翘首等盼。

其二，理论贵在能指导实践。通读《翻译》全书，读者十分理解郭教授并不反对一般翻译理论研究，只是他更钟情于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他的明确观点是：翻译理论要对翻译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必须总结和研究两种特定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同时一贯主张：“一般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理论的研究，是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更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这种高度概括的思想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对 20 世纪末中国译坛出现的某些“争论”文章的一个正面回答和有深远意义的总结。

其三，郭建中教授不仅有翻译研究专著多种，而且翻译、审校了上千万文字，涉及广泛的文体。除翻译了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摩尔·弗兰德》和库伯的《杀鹿人》等 10 多部中篇小说和文学名著之外，还翻译了一批有价值的词典类工具书，审译了“院士风采”这一类高难度的科学文献。至于长期为媒体翻译的有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文章，是他自认为的社会活动义务；其中，对科普和科幻作品的翻译，占据了尤为特殊创新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他与美国詹姆斯·冈恩联袂主编，并译成中文的《科幻之路》（六大卷，300 余万字），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我国科幻小说家、科幻研究者，以及青少年中间有广泛影响，并在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

社重印出版。1991年郭建中就曾荣获世界科幻小说协会颁发的世界科幻小说“恰佩克翻译奖”。他翻译的科普、科幻作品，都详加注释和评论。这在治学方法论上，至今仍有指导和现实意义。

四

毋庸置疑，郭建中教授的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经常是走在同行的前面的。《翻译》一书，仅仅是郭教授成果的一部分，但已十分独特和充满魅力。由于作者一直专心于中国教育事业，跟踪国内外翻译教学走向，处处贴近中国译坛实际，其理论精妙而实用。作品文字浅近、简洁而平易。有些从他本人翻译作品中抽出来的例句，在不同的文本和语境中得到重复使用，已成为经典式的范例，读来令人爱不释手。可见经典是不怕重复的。

一名翻译教授，能把学问做到他这种地步，而且至今还能精力旺盛、不断推出新成果的，实属凤毛麟角。我敬佩浙江大学及其外国语学院领导和同事，是他们支持《翻译》一书的出版，并推动了翻译研究的热潮。同时，我也深信，对郭建中教授著作的进一步研究，并进一步发掘其深刻的内涵，今后一定会在国际译坛上添加中国元素，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促进国内外译学研究的发展和学术交流。

贺《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论文选的出版，令吾人兴奋！
是为序！

2010年仲夏
于中国科学院

序 二

方梦之

郭建中教授从美国来电，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郭建中翻译研究论文选》作序。能在他的华章之外，留下拙笔些许，分享他成果结集出版的喜悦，我当欣然为之。回眸我们走过的学术道路，品味漫漫旧交，抒发一片厚谊，这过程是令人神往、十分惬意的。

我与郭建中教授邂逅于1987年7月首届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青岛）。自此，我俩交往频频。不只是因为杭州与上海相近，主要是彼此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气度，甚至担当着共同的社会责任。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我是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的正、副理事长。他是中国译协二至五届理事，我是三至五届理事。1995年亚洲翻译家论坛期间成立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我们都被推举为委员。这样，学术交流加上工作关系，屡屡晤面。

郭教授比我小三岁，但无论在翻译理论的深度、对译事的敏锐度或是接触翻译文体的广度都比我强，是我学习的榜样。在理论上他始终走在前沿，在翻译实践上他不断进取，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理论与实践俱佳的专家。所以，但凡我参与组织的全国性翻译研讨活动都请他莅临指导，例如，1999上海翻译研讨会（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与香港翻译学会合办）、2003年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上海）、2005年《上海翻译》创刊20周年座谈会、2005年第三届全国译学辞典暨翻译理论研讨会（上海）、2006年第二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广州）、2006年的高层翻译理论研讨会（苏州）、2007年第一届全国旅游及文化创意（多语种）翻译研讨会（北京）等。他是引领上述会议学术方向的主要学者之一，会议因他的到场而精彩。郭建中教授不尚空谈，很少空话、套话。他的报告都切中肯綮，直奔主题。即使请他作闭幕词，也不落俗套，学术含量依然丰富。例如曾请他做第三届全国译学辞典暨翻译理论研讨会的

闭幕词，他归纳了世界译学辞典的五大类型，提出了译学辞典的研究方向等，为此《上海翻译》像发表学术论文那样全文发表。

2002年和2005年，《上海翻译》编辑部先后举办过暑期翻译研习班，都请他授课，他的题目分别是“实用性文章的翻译”和“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他授课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既讲理论，又谈实践。他从自身翻译经历中提取实例，用现代译论加以诠释，娓娓道来，特别容易为学员接受。他认为：“一般从事实际翻译工作的人，往往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但重实践未必一定要轻理论。更有益的做法是重视实践，也要重视理论。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由理论来指导实践，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郭建中，2003）

一份高品位的期刊需要有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作为《上海翻译》的编委，郭建中教授的一批重要文章及译品发表在《上海翻译》上，如1999年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2001年的“实用性文章的翻译”、2005—2006年分两期发表的“汉英/英汉翻译：理念与方法”等。这是《上海翻译》的幸运。作为主编，我为此感到骄傲。

2006年初，《中国译学大辞典》启动，我请他当编委，他欣然接受。他试写辞条，积极参加编委会，对辞典的编写细则提出意见，态度十分认真。因他主编过《文化与翻译》论文集，熟悉文化学，就分工负责文化方面的词条。为此他投入了大量时间，探赜索隐，理清脉络，选写那些与翻译有关的文化词条。他是准时提供词条最多的作者之一。2008年他远在大洋彼岸，还发来e-mail，不忘为辞典补充新材料。

郭建中教授生于上海，到杭城求学，留在浙江。我生于浙江，长在上海，工作在上海。上苍不经意间让我俩对调环境，但我们却在翻译研究上“狭路相逢”。我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这从上面的简述中可见一斑。离开他的帮助，我的事业定会逊色。冥冥之中，这是缘分。

从书名可知，本书包括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三个方面。郭教授把它们有机联系起来，为之一统。他通过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来促进翻译教学，结合翻译教学的需要来搞翻译研究，而翻译研究又以翻译实践为基础。如此三位一体，辗转进取，使教学、理论和实践相得益彰、同步提高。在本书的前言中，郭教授把这样三方面的结合自谦为“三不像”，而这正是圈内很少有人能及的。

郭建中教授翻译、审校的文字超千万，而且涉及文体广，英汉、汉英并

重。包括文学名著,如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库伯的《杀鹿人》,以及索尔·贝娄、辛格、詹姆斯·肯尼迪等名家著作;工具书如《麦克米伦百科全书》、《世界英语俚语词典》和《中国语言文化背景汉英双解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with Cultur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科普和科幻作品的翻译也占了很大的比重;还有政治、经济、体育、旅游等方面的很多材料,其中多篇作为范文加上注释发表在《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等期刊上。

学术研究上,郭建中教授主张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理念与方法相结合。理论研究要建立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对翻译现象和翻译实践经验作出理论的解释;他的学术信条是“既要重视实践,也要重视理论”。其理论研究之路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1.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中为第一阶段,即以微观研究为主的阶段。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论文主要是自己实践经验的升华和语言学翻译理论探索,研究紧扣文本和实例,多从语言学角度加以阐述。如“英语定语从句的翻译”(1978)、“译文如何重现原著风格:从《傻瓜吉姆佩尔》的三种译本谈起”(1983)、“英汉翻译错误探源:比较一部小说的三种译文”(1993)等。这些成果在当时是不可多得的。他结合自己的感悟,由理论引导,对翻译中重要的实际问题条分缕析,归纳总结,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可贵的。译学研究的这一时期,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在语言学研究范式内运行。

不过,郭建中教授并没有一味沉浸于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和字对句比的研究之中。他不断寻觅理论上的症结,特别是从西学中获取营养。这时期发表的研究西方译论的文章如:“辛格谈翻译”(1985)、“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1989)、“直译和意译的新概念:介绍比克曼和卡洛的《翻译圣经》”(1989)、“Translatability in CE/EC Translation”(1995)等。到了90年代,郭教授对西方译论的精粹已了悟于心,做好了进一步开拓性研究的理论准备。“春江水暖鸭先知”,由于不断跟踪和关注西方译论的发展,处于学科前沿的郭建中教授敏锐地察觉到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很快迎面而上。(1990年,Lefervere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而真正形成气候又晚了几年。)

2. 20世纪中后期至今是第二阶段,即宏观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阶段。

郭建中教授的翻译文化研究国内领先。他以翻译的归化异化为切入点,1998年在《外国语》发表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归化与异化”。他认为:

1) 从归化向异化倾向的发展,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需要时间。2) 采用何种翻译策略, 最终取决于翻译目的; 归化或异化的译本, 在目的语文化中起不同的作用, 都有其存在的价值。3) 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4) 要重新厘定直译、意译和异化、归化的概念。他把直译与意译的定义限定在语言形式的转换; 把异化和归化限定在文化因素的移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种翻译方法: 直译+异化, 直译+归化, 意译+异化, 意译+归化。这一重新定义和四种翻译方法的分类具有重要的价值。1998 年的这篇文章后, 竟一发而不可收。1999 年发表了“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和“论奎因的不确定性概念”, 2000 年发表“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 2004 年发表“译学研究的第三次转向”, 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2006)、“韦努蒂访谈录”(2008)和“归化与异化: 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2009)等。而其中集大成者当推专著《美国当代翻译理论》(2000)。该书以深远的历史视角、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学科的方法来描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译论的流派种种; 特别介绍文化学派的背景、成因、走向及其代表人物。该书已成为我国迄今为止研究西方译论的经典读物。他不但自己深入研究翻译的文化问题, 而且关注国内其他学者的研究。为此, 他主编了《文化与翻译》论文集(2000)。文集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两部分, 精选了我国老一辈翻译家和中青年学者的论述。他在前言中特别告诫读者: “文学-文化学派的理论也有其片面性。因为, 翻译固然要考虑到文化问题, 但最终还得通过语言的操作来完成翻译的过程。因此, 在翻译研究中, 语言与文化、宏观与微观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忽视。”事实证明, 这种宏观和微观交相辉映的、理性的、辩证的观点, 在 10 年后的今天仍然非常中肯, 非常适用。这本书同样受到译界的青睐, 具有较高的引用率。

新世纪以来, 我国应用翻译市场急剧扩大, 翻译量与日俱增, 翻译手段日益进步, 翻译形式日趋多样, 翻译文体灵活多变, 而应用翻译的研究相对薄弱。根据市场和教学的需要, 他作出积极反应, 发表了多篇应用翻译的研究论文, 如: “实用性文章的翻译”(2001)、“关于路名标识的拼写问题”(2003)、“汉英/英汉翻译: 理念与方法”(2005)、“再谈街道名称的书写法”(2005)、“街道路牌标识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2007)、“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2008)等。

此外, 科普和科幻作品的翻译及其研究亦是郭建中教授翻译人生中的亮

点。他主编和翻译了多套国外科幻丛书，其中六大卷中文版《科幻之路》被誉为“科幻宝典”。由于他在译介国外科幻小说方面的突出成就，1991年被世界科幻小说协会授予“科幻小说恰佩克翻译奖”。他是中国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人；1997年又获北京国际科幻大会翻译奖——“金桥奖”。他这方面的论文有：“论科幻报告文学”（1985）、“科幻小说：憧憬和预测的文学”（1991）、“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前景”（1997）、“科幻小说：科学时代的文学”（1998）、“关于 Science Fiction 的翻译问题”（2004）、“重写：科普问题翻译的一个实验——以《时间简史》（普及版）为例”（2006）等。郭教授在科普和科幻翻译研究方面的杰作当为专著《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2004）。对此，我曾以“科普和科幻翻译研究的开山之作”为题写过书评（2005），认为本书标志着我国科普和科幻翻译系统研究的崛起，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进步添上浓重的一笔，是一本开创性的著作。

郭建中教授成果累累，事业成功的背后有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底气和“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追求，这更值得我们体会和深思。

2010年6月

前言

一

国内翻译界的不少朋友,都希望我能编一本自己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选。我自己却一直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故犹豫再三。今年年初,我的朋友杭州市译协执行会长应远马老师、浙江外国语学院桂清扬教授等与我商量召开关于我的翻译思想和翻译作品的研讨会事宜。对此我深感惶恐,故婉言谢绝了!但他们一再强调,此举主要是想藉此推动浙江省高校的翻译研究工作,说到这一步,我也自然“恭敬不如从命”,以不辜负热心朋友的鼓励和支持。这就是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这本翻译研究论文选的到来。

我 1957 年 9 月入当时的浙江师范学院英语系求学,1961 年夏天从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四年的本科学习,有两年时间是在下乡、下厂劳动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实际用于读书的时间,最多只有两年。因此留校任教后,深感业务底子薄弱,只得认真进修,以弥补四年本科学习之不足。刚在业务上打了些基础,1966 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又整整浪费了十载最宝贵的年华。从 1978 年正式发表第一篇论文至今,已有 30 余年了。在这 30 多年中,我主要从事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工作。1979 年之后,主要是教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翻译课程。

二

我深有体会的是,做翻译教师有三不易!

一不易是,作为翻译教师,没有翻译实践经验且不说教不好学生,就是学生听你的课也不服气。教翻译课与教文学或文学理论不同。教文学或文学理论的,学生不会要求教师也一定要会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写戏剧。教翻译不同,学生听你对别人的译文评头品足,那你自己的译文呢?翻译教

师在评头品足之后, 必须拿出自己的译文, 才能使学生信服。

二不易是, 一般从事翻译工作的人, 可能只要搞英译中或中译英。可是, 教翻译的, 既要教英译中, 又要教中译英。所以, 翻译教师的翻译实践, 也必须是双向的。

三不易是, 一般从事翻译工作的人, 只要多搞翻译实践, 不一定需要花很多时间研究翻译理论。只要知其然, 不一定要知其所以然。翻译教师则不行。不仅要知其然, 还一定得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不得不研究翻译理论。这就像做英语教师一定得懂语法一样。

就这样, 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尚能称职的高校翻译教师, 我不得不既从事翻译实践, 又从事翻译理论的研究工作。在从事翻译实践方面, 又不得不既从事英译中, 也从事中译英的实践。说得好听点, 是“三位一体”; 说得不好听点, 是“三不像”。我更接近于后者!

在翻译研究中, 我不反对一般翻译理论的研究, 但更钟情于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因为, 翻译理论要对翻译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必须总结和研究两种特定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但这种总结和研究, 又必须是在一般翻译理论的观照下进行的。所以, 我一贯主张, 一般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理论的研究, 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更不应是相互排斥的。

我自小对科幻小说感兴趣, 从事翻译实践时, 不由自主地去翻译一些科幻小说。因为要搞翻译, 也必须研究科幻小说。这是我进行科幻翻译和科幻研究的初衷。

三

这本论文选分上编、下编和附录三个部分。

上编选的是我大部分的翻译研究论文, 以及个别专著中的有关章节, 是我对翻译问题的一些体会和想法, 谈不上什么“思想”。论文顺序以发表时间先后安排, 以可追踪自己的学术研究轨迹。其中, “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汉英/英汉翻译: 理念与方法”和“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等几篇文章, 都是阐述自己的翻译理念的, 只是试图从不同的理论角度, 论证这些从自己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体会, 因而显得有些重复。因为是自己翻译实践的总结, 因此其中的例子绝大部分也都是从自己的翻译作品中抽出来的。个别例子比较典型, 能比较有力地论证自己提出的理念, 因而也被重复使用; 有时同样的例子可能用来论证不同的概念, 这是因

为分析的角度不同。对此我在这里是需要略加说明的。不过读者可以从这些文章中看到，我的一些翻译的理念是在不断总结的过程中，逐步系统化的，而不是一步到位的。

下编选的是我自己专著和重要译作的序言、后记，以及我为学者朋友的专著写的有关翻译方面的序言。因为其中也包含了我自己对翻译的一些想法，因此也编入了这个文选。

附录部分是学者们为我的著作写的序言、评论和对我的访谈。

我对翻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不管是英译中，还是中译英，在忠实于原文意思的前提下，译文必须通顺易懂。我把译意、替代、重构、重组、重写的方法和技巧，提高到在语言操作层面对翻译本质的认识问题。其中特别提出，替代和重写是翻译本质的观点。这是本人在翻译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其理论基础是汉英两种语言在语法和词汇结构上的巨大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用译入语的表达方式来替代源语的表达方式。在文化操作方面，“归化”抑或“异化”，则视原作者的目的、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译文读者对象等可变因素而定，并认为，可以把归化与异化的概念纯粹作为话语策略来考虑，但不排除话语策略的选择对文化移植和译者对外国文化与外语文本道德态度的影响。因而提出了对直译、意译、异化、归化的重新定义和组合。

我也尽可能地把自己对翻译的一些想法，应用到实践中去。因此，在我的译作中，如《鲁滨孙飘流记》第一版、第二版的译序和《摩尔·弗兰德斯》译序等，均亮明了我的翻译观点和翻译策略。这也许是“三不像”的好处，因为可以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把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再用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如此往复循环，不断推进实践，深化理论，并把理论建立在扎实的实践基础之上。

“三不像”的坏处，也是明显的：那就是精力分散，不易在一个领域积累和超越。如果单纯只搞理论研究，成果也许更显著；如果单纯只搞翻译，甚至只搞英译中，或只搞中译英，那这些精力花下去，真可能是“译著等身”了。但我首先是一个教师，其次，是一个翻译工作者，同时还要承担翻译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义务。所以，即使自己成了“三不像”，也无半点悔意！

我在文章中所表达的自己对翻译的一些看法，只是个人的体会，期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